



复旦
中华文明研究
专刊



中印关系研究的视野与前景

沈丹森 孙英刚 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复旦中华文明研究专刊

中印关系研究的视野与前景

沈丹森 孙英刚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印关系研究的视野与前景/沈丹森、孙英刚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7
(复旦中华文明研究专刊)
ISBN 978-7-309-12323-4

I. 中… II. ①沈…②孙… III. 中印关系-研究 IV. D822.3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18442 号

中印关系研究的视野与前景

沈丹森 孙英刚 编

责任编辑/史立丽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8.75 字数 274 千

2016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2323-4/D·823

定价: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

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tudi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CSCC)成立于2012年3月。中心以复旦大学人文学科为平台,旨在依托本校深厚的人文学术资源,积极推进国际学术界对中华文明的研究,促进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对话。我们知道,自明末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华以后,欧洲和北美,即所谓“西方”的学者对中华文明展开了持久而深入的研究,历来称为“汉学”(Sinology)。近年来,中国学者为了与清代“汉学”相区分,又称其为“海外汉学”。在欧美,学者为了区别传统的“Sinology”,又主张把现代研究称为“China Studies”(中国学)。ICSCC旨在促进中国学者与海外汉学家在中华文明研究领域内的国际交流,推动双方之间的对话与融通。

历史上,欧美汉学家有自己的旨趣和领域,他们的方法和结论,常常别开生面,新论迭出。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以外的国际学者早已跨越障碍,深入到中国文化内部;中国大陆的新一代学者也已经接续百年传统,回到国际学术界,与海外同行们频繁交流。但即便如此,海外汉学家和中国本土学者在很多方面,诸如文献整理、田野调查、新领域开拓以及方法论、世界观上仍然存在很大差异。海外学者所长,即为本土学者之短,反之亦然。有一种观点认为,本民族的文化,很难为另一种文化内的学者所理解。甚或是说:外国人必不能以正确的方式看待“他者”的文明。这种观点的不合理之处,在于用某种原教旨主义的方式堵塞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事实上,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现实中,人们都不只是生活在单一的文化中。东海西海,圆颅方趾,文化的特殊性是相对的,人性的共通性才是绝对的。为了达成对中华文明的正确理解,显然还需要中外学者坐下来,用对

话、讨论的方式作沟通与融合。无论如何,海外汉学家早已成为与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华人学者同样重要的研究群体,他们对于中华文明也有着独到的理解。“海外汉学”的研究成果,值得我们本土学者加以重视,全单照收和简单排斥都是要不得的极端态度。

四百年前,明末“西学”翻译运动先驱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我们把明末的这句格言引申出来,作为中外学术交流中的“金科玉律”。中西方学者之间相互借鉴,即了解对方工作的真实意义和真正主张。立场不同,可阐发双方优长之学;视角各异,可兼收领域互补之效;观点针芒,实可在讨论之后达成更加充分的会通和融合。四百年来,明、清、民国的经学家、国学家,一直和欧美的传教士、外交官和“中国通”切磋学问,现代中国的儒学、佛学和道学,无一不是在与利玛窦、艾儒略、林乐知、李提摩太、李佳白、费正清、李约瑟等欧美学者的对话交流中,经过复杂的交互影响而形成的。离开了“西学”(Western Learning)和“汉学”(Sinology)的大背景,从徐光启、阮元的“新学”,到康有为、章太炎的“国学”,都不可理解。我们相信,学术领域此疆彼界的畛域之分,既不合理,也无可能。海外汉学(中国学)与中国本土学术并不冲突,所谓的主客之争,那种有你没我的势不两立,完全没有必要。

有鉴于此,ICSCC设立专项资金,面向海外,每年邀请国外优秀中青年学者访问复旦大学,与本校、上海地区以及全国各地的同行学者们充分交流。通过学术报告、小型工作坊、论文集和学术专著的编译出版等,构建访问学者与国内学者的全方位、多层次交流体系,促进海外汉学家与中国本土学者之间的互动。中心邀请来访的海外学者与中国学者合作,将他们主持的工作坊论文,经过作者本人的修改、增订,或由编者整理、翻译,结集出版,即为“复旦中华文明研究专刊”系列。我们希望藉此工作,展现中外学者精诚合作的成果,以饕学界。

目录

1	导 言	
13	徐文堪	关于印中语言接触史的一些问题
27	严耀中	印度宗教中声音的作用及在华土之影响
43	周伯戡	从边国到中土：佛教中心由印度到中国转移的一种解释
65	宁梵夫	重估“边地情结”：汉传佛教中对印度的逐渐容受
77	陈 明	一角仙人故事的文本、图像与文化交流
123	孙英刚	大雁塔为什么叫“雁塔”
136	麦文彪	古代中国与日本的“异域天学”：七曜日与天宫图星占术
152	李 辉	《大方等大集经》中的“二十八宿直日术”复原

167	杨 斌	清迈法典、海贝和亚洲的文明交流
182	刘 震 陈怀宇	《象腋经》经名考
191	段玉明	“西方”的漂移 ——以元代来华的印度高僧指空为例
203	王启元	明代文学想象中的印度
221	马达维· 塔姆皮	殖民地时期印度—中国之间的关系研究
230	徐启轩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胡愈之对印度反殖民运动认知迭 变初探
242	沈丹森	20 世纪初期的泛亚洲主义及印度—中国的互动
275	郁龙余	谭云山：殖民时期中印关系的伟大智者
294		作者简介

导 言

何谓中印研究？

中印研究领域从未有过界定。一个原因是这个领域在大专院校内仍未有明确的课程规划；另一个原因则是可融入此领域的学术内容太多太广，难以梳理。有关印度与中国之间在历史上和当代的互动，以及两国比较研究的著述，或许最容易被划入中印研究的范畴内。这两类研究可包含若干子类，如探讨佛教流播与影响、两国历史上的商业往来或当代经济关系，或比较国家形成、战略政策及其他方面的研究。一些分析将重点放在双边关系与比较上，另一些则把中印关系放在一个更广泛的区域或全球框架内进行讨论。另外，还有印度人和中国人的相互描述，如行记、评论、译文甚至网络帖子，这些材料均为中印关系提供了重要见解。

以上三个类别或可初步勾勒出中印研究的轮廓，也有助于划分中印问题研究与著述从 19 世纪演变至今所经历的四大阶段。这四个阶段分别是：萌芽阶段（19 世纪）、泛亚洲主义阶段（1901—1961）、冲突阶段（1962—1988）、中印大同阶段（1988 年至今）。以下将谈到，中印研究在很多方面受到当时地缘政治和双边关系的影响。一方面，19 世纪的史料翻译主要由欧洲汉学家展开，与欧洲帝国主义延伸至亚洲有密切关系，而亚洲学者在泛亚洲主义阶段推动的新一波学术研究，则是对欧洲殖民主义在亚洲扩张的一种回应。另一方面，学者在后两个阶段发表的著作，则明显受中印关系恶化及其后两国经济崛起所影响。

萌芽阶段(19 世纪)

在 19 世纪出现的两类重要著作对中印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有着巨大影响。一类是中国僧人在公元第一个千年巡礼印度时所做的记载及相关翻译和注释；一类则主要是中国人为理解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并从中汲取教训而撰写的著作。一些 19 世纪的翻译作品经多次重印、广泛发布，让一些在 19 世纪晚期形成的观点有了持久的影响。

过去一个世纪有关古代中印历史互动的研究，主要以 19 世纪出版的法显、玄奘和义净等中国僧人行记的翻译为依据。这些翻译不仅点燃了学术界研究亚洲佛教交流的热情，激发了人们对英属印度考古研究的兴趣，更为一些倡导泛亚洲团结和酝酿大印度构想的著述提供了根基。法国汉学家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 1788—1832)和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分别是法显《佛国记》和玄奘《大唐西域记》的最早译者(于 1836 年和 1853 年先后出版)，沙畹(É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在 1894 年翻译了义净法师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英国学者比尔(Samuel Beal, 1825—1889)于 1869 年和 1884 年分别将法显(和北魏僧人宋云)以及玄奘的著述译成英文。他更于 1911 年出版了玄奘传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译本。苏格兰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也在 1886 年翻译出版了法显著述。除了这些欧洲译者之外，曾在英国求学的两名日本学者高楠顺次郎和南条文雄也发表了在欧洲和亚洲广泛流通的学术名著。高楠于 1896 年翻译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南条于 1883 年编纂大藏经目录。

这些译本旋即引起东方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兴趣。其中最著名的学者为亚历山大·康宁汉(Alexander Cunningham)，他也是印度考古调查局的首任局长。他在 1871 年出版的《印度古代地理》序言中对中国僧人著述的存在表示感谢，并指出，自希腊作家托勒密在公元 2 世纪中期带人窥探此地区的面貌之后，关于古代印度的记载就变得非常罕见。他因此认为：“但幸好发现了公元 5、6 和 7 世纪几位中国僧人的行记，我们如今才得以照亮一个原本黑暗的时期，并清楚地将大部历史碎片拼成一副完整的古代印度地理

图。”据说康宁汉走访印度几处重要考古遗址时曾携带玄奘行记。印度学者密特拉(Rajendralala Mitra)在1878年于《菩提伽耶：伟大的佛寺、释迦牟尼证道处》中亦广泛引用玄奘著述。康宁汉和密特拉皆为使用古代中国史料研究古代印度的做法打下基础。

这些研究在很多方面受欧洲帝国主义在亚洲扩张的影响。汉文一手文献的翻译及其在印度殖民考古研究中的使用也激发了更大规模的东方学研究,尤其那些事关“广袤、伟大”殖民帝国的项目。中土僧人的行记也逐渐成为20世纪初期在印度和中国兴起的民族主义著述的一部分。就学术质量而言,被译成西方语言的亚洲古代著述,反映了19世纪法国和英国研究印度和中国的趋势,如吉瑞德(N. J. Giradot)在评论汉学状况时指出:“着重第一手文本的翻译,并只附上基本的注解。”这类研究不太注重对所述之人、事开展批评性的分析,而这种对中土僧人记述全盘接受的毛病,依旧是日后中印互动研究的一个缺点。尽管如此,这些译文拉近了欧洲汉学家和印度学家的距离,初步创造了可被称为“中印学”(Sino-Indology)的中印研究子领域。师觉月(Prabodh Chandra Bagchi, 1898—1956)和季羨林这两位20世纪的学术领袖,都是这一领域的佼佼者。

欧洲帝国主义也在亚洲推动了第二类著述——中国官员在19世纪最后25年到印度考察时的记述。考察目的包括搜集有关印度的资料和评估英国向大清领土扩张的可能性。它们对朝廷、知识分子甚至是一些地方政府掌握英国在印度政策和边疆地区局势尤为关键。

最早访问印度的清朝官员中,由四川总督丁宝桢派遣前往考察的黄茂才于1879年3月取道缅甸入印,逗留6个月,回国后完成有关印度局势的详细报告。其中对印度在英国统治下所取得的发展时有欣赏,并向丁宝桢建言,来自英国的威胁不在阿萨姆边境,而在大吉岭和锡金接壤地带。嗣后不久,李鸿章于1881年派遣熟谙国际法的马建忠与英国官员商讨是否可能停止鸦片贸易。马建忠在吴光霁的陪同下于7月5日抵达加尔各答,此后巡游印度25天。两人都不知黄茂才两年前的到访和行记,因而沿着同样的路线巡游。马建忠此行未能说服英国官员对中国禁运鸦片。他和吴光霁分别撰写了《南行记》和《南行日记》。这几部行记都是反映19世纪晚期中国人对印度观点的重要史料。在此也要指出,第一部由印度人撰写的中国历

史也在这一时期面世。班迪奥帕迪亚雅(Krishna Dhan Bandyopadhyaya)以孟加拉语撰写的《中国历史》于1865年出版。

19世纪出现的第三类著述,则与区域内不断强化的亚洲人身份意识有关。20世纪初,这类著述成为倡导亚洲团结的泛亚洲理想主义的核心。亚细亚主义(亦称亚洲主义或泛亚洲主义)思想起源于1880年代的日本,并在亚洲兴起的反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中诞生,主要以一些作家对亚洲社会在欧洲殖民主义入侵之前友好和平相处的看法作为依据。

泛亚洲主义阶段(1901—1961)

20世纪初期印度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对两国人如何看待自身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曾指出,所有良性的民族主义都具有跨越民族的视野。正因此,19世纪末在日本崛起的泛亚洲主义论述才会同印度与中国的民族主义著述相互交织。中土僧人行记中所提到的佛教联系,为这些作者提供了最佳典范。他们不仅以此连接中印,还以佛教流播亚洲多数地区的事实来证明亚洲文明的普适性和同质性。与之平行的是对中印历史的互动研究,这股趋势始于欧洲(及后美国)的汉学家和印度学家。此时也出现了许多行记和著作。20世纪前半期是中印研究百花齐放的时期。

1901年,清末“百日维新”领袖康有为来到大吉岭。数年后,日本学者冈仓天心提出“亚洲一体”的构想,并让泛亚洲主义思想在印度和中国知识分子中普及。康有为也像黄茂才、马建忠和吴光培等人一样游历英属印度并撰写行记。然而,他把写作重点放在印度的社会和行政问题上,并表明如果中国也实行类似的区域自治政策,将遭遇“类似的不幸”。印度的此种“不幸”迅速成为中国人谈论印度的一个重要观点,印度被中国人视为“亡国”——因为力量被宗教习俗和社会分化削弱,印度人成为数千英国殖民者的奴隶。这种言论经常出现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报章上,而英国人往自己所控制的中国地区派驻锡克士兵,更使这类批评加剧。几乎在康有为对印度发表批判性观点的同时,勒克瑙出现了一本非常不同的印地语书籍。作者辛格(Thakur Gadhadr Singh)是印度一名下层士兵,曾是英国在华军

队的一员，被派往中国与义和团作战。辛格拒绝参战，并在日记《中国十个月》中批评英国帝国主义。他的日记或许是20世纪初期的流行读物中最先倡导印度人和中国人共同抵抗帝国主义的著述之一。

在泛亚洲主义框架中探讨中印互动的著述，起源于20世纪首十年的日本。此时，那里聚集了许多印度和中国的年轻革命者。章太炎和达斯(Taraknath Das, 1884—1958)是两个深受日本学者所提出的“亚洲一体”概念影响的关键人物。两人都认为印度和中国应接受当时唯一的亚洲大国日本的领导，联合起来对抗欧洲帝国主义。但与此同时，日本的意图也开始令人关注、感到犹疑。于是，章太炎转而强调中印联盟，取代之前的中日同盟。1907年，他发表《亚洲人道主义兄弟会章程》，谈及自己的愿景：“我们可以先团结起东方两片最古老最辽阔的土地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国家若能获得独立，就能形成亚洲的保护屏障，让许多国家受益。”章太炎撰写数篇文章，突出印度在亚洲的重要性和中印古代联系。这是中印研究领域首次有人直接将中印之间的历史和当代互动放在泛亚洲主义的框架中加以论述，由此引发大量文章，以团结印度和中国“受压迫”人民为清晰目标。

另一方面，泛亚洲主义思潮也影响了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梁启超于1902年旅日时曾撰文探讨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1921年，他发表题为《中国—印度之交通》的文章，列举中印历史交流的重要事迹。他在文中提到，“东方文明起源于中国和印度”，而印度和中国如同昆弟。三年后，泰戈尔访华。梁启超在北京欢迎泰戈尔时道：“印度和中国在国民性和地理上均像孪生兄弟。在多数文明人种有所动静之前，我们兄弟俩已经开始研究关系整个人类的大问题。我们已为全人类的福祉成就了许多。印度在我们之前，而身为小弟的我们，追随其后。”对于两个地区之间的最早接触，梁启超强调：“身为历史学家的我们能够肯定的是，我们之间以兄弟相称的最早交流发生在公元第一个世纪。”

20世纪初的上海是中印知识分子和革命者交流互动的枢纽，也同是泛亚洲主义思想孕育中印研究之地。印度社会学家萨卡尔(Benoy Kumar Sarkar, 1887—1949)是推动此发展的首批贡献者之一。1916年，他在上海撰写《印度教徒眼中的中国宗教：亚洲思想趋势之研究》一书，由清末民初官员和革命者伍廷芳作序。同样，与章太炎交情甚笃的达斯一年后也在上

海出版《日本是亚洲的威胁吗?》一书,并在第一章分析了中国的政治局势。曾在1905年访问印度的唐绍仪为此书撰写引言,并突出印度的重要性:“长远而言,日本和中国不应该无视印度人民的问题,因为一个强大自由的印度对它们来说将是一个力量的源泉。”萨卡尔和达斯都热烈支持一个团结一致并由日本领导的亚洲,而萨卡尔更是强调亚洲三个国家之间的“共同精神”。

圣蒂尼克坦,或许是泛亚洲主义思想影响下中印研究扎根的最重要的地方。泰戈尔未到中国之前,就已对在自己所创办的国际大学(Viswa Bharati, 1921年在圣蒂尼克坦创立)开展中国研究深感兴趣。著名欧洲学者列维(Sylvain Lévi, 1863—1935)和图齐(Giuseppe Tucci, 1894—1984)于1922年至1923年间到访圣蒂尼克坦。他们属于新一派的“东方学家”,并把研究亚洲的重点放在翻译以外。沙畹及其学生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也属此派。以收藏敦煌手抄卷而闻名的伯希和为理解中印在佛教联系以外的多元性历史互动作出显著贡献。此外,在牛津大学从事印度学研究的学者许地山也在1920年代开始出版中印文学比较研究的著述。

1937年,中印协会分别在印度和中国成立,国际大学也成立了中国学院。创建这两个机构的关键人物谭云山,是一名来自湖南省的虔诚佛教徒,同时也是汉语教师和报纸编辑。1927年,他在新加坡会见泰戈尔,后成为中国学院的首任院长。谭云山决定以研究中印古代互动和英译汉文佛经为学院的主要使命,并以倡导中印关系推进泛亚洲主义思想,这在1930年代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已成为必要的政治举措。自中国学院成立至二战结束,其出版物、展览以及在学院内展开的外交往来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联合抵抗日本。包括蒋介石著述在内的一些宣传材料也在中国战时陪都重庆被译为印度地方语言。

中国学院和国际大学也培育出另一股学术力量,主要体现于纳格(Kalidas Nag)和师觉月的著述。纳格和师觉月在法国时是列维的学生,曾经访问中国。两人也是大印度协会的成员,该协会的宗旨是在亚洲推广印度文明。师觉月以各种翻译、专论、文章和《中印研究》期刊成为开展中印佛教互动研究的关键人物。《中印研究》于1947年至1957年间出版,所载文

章或许是其时最细致的研究。

这一时期的中国,即1930—1950年代间,陈寅恪、周一良、徐梵澄、饶宗颐 and 季羨林等学者也在为中印学作出开创性的贡献。陈寅恪和季羨林在欧洲曾受教于顶尖的印度学家,饶宗颐在中国学习,梵文知识多靠自修习得。此时另有其他中国学者就中印关系各方面撰文。林语堂和张君勱用英文写作,并像章太炎一样欣赏印度的文明成就,力倡中印友谊。金克木则在1941—1946年间就读于中国学院,回中国后加入北京大学,1957年撰写《中印人民友谊史话》一书。

行记是中印研究在泛亚洲主义阶段的重点文体之一。周游世界的孟加拉人比斯瓦斯(Ramnath Biswas)在1931年代骑自行车穿越中国;新闻记者卡拉卡(D. F. Karaka)于1944年出版《重庆日记》;谭云山也记录了自己在1930年代初的印度之行;摄影家庄学本在1940年代初留印期间拍摄了一千多张照片。这类游记的数量在1950年代有增无减,其中包括金克木和阎文静的汉文著述、印度人潘尼迦(K. M. Panikkar)的英文著述、巴苏(Manoj Basu)的孟加拉文著述和喳乎桑喀理桎央(Rahul Sanskritayan)与夏斯特里(Brajkishore Shastri)的印地语著述。说到后一种类作品,单单是印度代表团1951年访问中国时就产生了十部出版物。

此外,学术期刊、报章和杂志也刊登了许多有关印度和中国的文章。在莱顿出版的《通报》收录了欧洲顶尖研究者的学术论文。在圣蒂尼克坦出版的《国际大学季刊》、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以及在加尔各答刊行的《大印度协会期刊》和《现代评论》等亚洲主要期刊和杂志都刊登了中印历史和当代互动的著述。大菩提寺期刊《大菩提》和颇有影响力的中国佛教期刊《海潮音》收录了有关佛教交流和联系的著述。此外,一位署名“印—中”(“Hindi-Cheeni”)的印度学者兼外交官撰写的《中共革命之前印度的中国观》中也对1949年以前印度杂志和报章中有关中国和中印互动的文章作了精辟概括。

冲突阶段(1962—1988)

1962年的中印战争给中印研究带来了巨大冲击,并由此改变了这个领

域的方向和主要研究的性质。中印当代关系及两国冲突成为学者、记者和专栏作家最关注的课题。

尽管仍打着“印度人—中国人是兄弟”的旗帜，独立后的印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裂痕已开始在一些中国报纸和杂志文章中显露。这些评论早在1949年便开始出现，多为对尼赫鲁及其在西藏问题上观点的批评。随着两国间的政治问题在1950年代后半期加深，《潘查希拉时期及其后》等书的作者贾殷(Girilal Jain)与其他一些印度作家将这些中文社论视作酝酿中的地缘政治分歧。1962年的战争让中印冲突在此后20年成为首要课题。这个时期的大量著述包括对边界划分历史的详细研究、军事冲突的原因分析以及将冲突归咎于尼赫鲁及印度外交政策或给中国人贴上叛徒标签的辩论文章。

其中，阿拉斯太尔·兰姆(Alastair Lamb)开展了部分有关中印边界争端历史的广泛研究，著有《中国—印度边境：边界争端的根源》等书。内维尔·马克斯韦尔(Neville Maxwell)的《印度的中国之战》则成为专门探讨印度及尼赫鲁政策失败的经典战争叙述。另外，穆利克(B. N. Mullik，印度情报局局长)、考尔(B. M. Kaul)、梅赫拉(Parshotam Mehra)和卡鲁纳加尔·古普塔(Karunakar Gupta)等也对这个课题有所探讨。

中方对边界争端和军事冲突的论述则多在官方出版物发表，海外华人主要中文期刊《侨务报》也有报道，主要是1960年代初被驱逐出印度的华人的个人叙述。中国学者直至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才开始发表相关观点。然而，他们并未停止研究中印历史互动和印度文学与历史，尽管有时不得不秘密行事，如季羨林在“文革”时期就这么做。

季羨林在这一时期的主要贡献包括对几部印度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罗摩衍那》的研究和翻译，以及探讨佛教初入中土与传播和中印之间技术和知识交流的文章。他也在《天竺心影》一书中以感人的笔触描写自己于1978年的印度之行。季羨林的另一部主要著作是他与其他中国印度学家和佛学家合作编写的《大唐西域记校注》。这项工作始于1977年，于1985年完成。除季羨林以外，汤用彤、罗香林、向达和张广达等几位中国学者也为中印历史互动提出论述。更重要的是，这些学者也开始培育新一代从事中印研究的中国学者。

另外,尽管有更多人对中印当代政治关系感兴趣,欧洲、北美和日本的中印历史互动研究也大有进展。冉云华、许理和(Erik Zürcher)、富安敦(Antonino Forte)、谢和耐(Jacques Gernet)、松长有庆、薮内清、辛岛升、桑山正进、米歇尔·斯迪克曼(Michel Stickman)和梅维恒(Victor H. Mair)等学者的研究,在列维、沙畹和伯希和等人所立下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而在苏联,施泰因(V. M. Shtein)和博克夏宁(A. A. Bokshchanin)对此研究的贡献也令人瞩目。

试图改造昔日中印兄弟情谊概念的泛亚洲主义类型篇章,在此阶段末期开始出现。这类文章的主要作者,是一些想跨越两国边界问题和地缘政治问题激烈争论的印度和中国作家。这些想要促进中印友好关系的作者对题材的选择较为严谨,对第一手史料的运用不那么挑剔。随着“中印大同”(Chindia)这一词汇的发明,这类偏向理想主义的篇章在中印研究的下一阶段愈发普遍。

中印大同阶段(1988 年至今)

过去 20 年,关于“中印大同”主题的出版物在两国显著增长。此阶段的中印研究出版物已成规模,题材多样,质量差异也很大。促使中印研究突然盛行的原因和大环境,也比前几个阶段的来得复杂许多。

拉吉夫·甘地在 1988 年访华、冷战结束和 1990 年代中印经济快速增长等因素,改变了两国之间的互动,更吸引学者和作家关注印度和中国。

这个阶段的一个重要发展是一些致力于中印研究的项目和机构的成立,其中包括 2005 年创立的纽约新学院印中研究所、亚特兰大的印—中—美研究所、位于昆明的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以及德里的中国研究所。另外,有关印度和中国的研究也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北京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新德里民营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等机构的关键部分。

自 1988 年起,中印研究变得更加多元化。对中印历史互动的分析继续出现重大进展,其中一些杰出著作包括王邦维、船山彻(Toru Funayama)和宁梵夫(Max Deeg)对佛教僧人行记和贡献的研究;陈明对印度医药影响的

考察；布歇(Daniel Boucher)对大乘佛教传入中土的研究；刘欣如对7世纪前古代印度和中国之间商业往来的讨论；以及玛姐玉(Madhavi Thampi)和马世嘉(Mathew Mosca)对殖民时期两国联系的探讨。他们的研究都从有关中国佛教、南亚历史与考古、中外互动以及远程海上与陆路网络的最新研究发现和解读中受益。一些有关中印历史互动的研究史料目录也在此时面世，如耿引曾辑录的《汉文南亚史科学》(公元前至19世纪)和哈拉普拉萨德·雷(Haraprasad Ray)所翻译的部分史料。

另外，一些讨论1962年冲突后中印边界争端和中印关系的新著也在此时出现。刘学成的《中印边界争端与中印关系》、高龙江(John W. Garver)的《持久的竞赛：20世纪中印对立》和努拉尼(A. G. Noorani)的《中印边界问题，1846—1947：历史与外交》是这方面的三部力作。C·拉贾·莫汉(C. Raja Mohan)和莫汉·马利克(Mohan Malik)对中印关系作了不同预测。另有几部论文集讨论了当代中印关系更广泛的影响，如弗朗辛·R·弗兰克尔(Francine R. Frankel)和何汉理(Harry Harding)的《中印关系：美国需要知道什么》。

中国大陆学者关于中印战争和拉吉夫·甘地访华后续的著述为这个时期的中印研究作了最突出的贡献。孙晓和陈志斌的《喜马拉雅山的雪——中印战争实录》以及王宏伟的《喜马拉雅山情结：中印关系研究》是研究边界争端的两部早期著作。此后，地区研究、当代经济政策与政治制度以及文学和哲学的比较研究领域都出现不少著作。

有关中印比较研究的英文著述内容也同样丰富。如费里德曼(Edward Friedman)和吉尔利(Bruce Gilley)合编的论文集《亚洲的巨人：比较中国和印度》、司乐如(Lora Saalman)编著的《中印核交叉路》。中印经济政策和发展及其全球影响的比较、印度和中国崛起的影响等角度都有学者论述。

在某些方面，“中印大同”时期的著作是世界对比较印度和中国开始感兴趣的产物。印度政治家拉梅什(Jairam Ramesh)率先提出这样一个词汇，引起媒体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如泛亚洲主义者所提倡的一样，“中印大同”也表明支持中印团结，但前提是以全球而非亚洲问题作为考量，其强调中印之间的“文明”互动(尤其是伊斯兰教传入之前的互动)，或想象两国在未来的联盟，对当前的地缘政治问题则避而不谈。